

# 《道德经》： 从语内接受到语际翻译的经典之合

杨 艳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道德经》是中国哲学与文学的经典之作,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也已跨越几千年的历史。本文以《〈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为主要个案,试图从研究范围、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实践价值等层面出发,对《道德经》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创新价值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发现,《道德经》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语内接受与语际翻译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呈现出研究范围创新、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多向度、具有多重实践价值的新态势,凸显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 《道德经》 中国文化典籍翻译 译介与传播 异文化语境

杨 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210023

## 引 言

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近年来学术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中国文化的灿烂星空中,《道德经》既是伟大的哲学著作,又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和文学发展影响深远。“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老子为后世诸人开启了一段玄妙之旅,吸引着人们去孜孜探求其哲理和文艺的奥秘,形成了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道德经》阐释接受史。

古往今来,历代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角度众多:有从思想角度研究的,有从历史角度把握的,有从文学角度赏析的……关于《道德经》的各种注疏、解说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推进,关于老子《道德经》在异域的翻译与传播情况也日益受到重视。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传统的研究要么关注《道德经》的语内阐释,要么探究其在异文化语境中的翻译、传播与接受,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甚少。

而最新的《道德经》研究致力于将语内阐释与接受和语际翻译与传播两种研究模式对接起来,多维度、宽视域地探讨了中西文化在哲学经典文本阐释过程中的相遇、碰撞与融合,其独特的创新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为主要个案,从研究范

围、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实践价值等层面出发,对《道德经》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创新价值进行探讨。

## 一、语内与语际：“两张皮”的巧妙结合

在语言研究方面,传统研究中一直存在“两张皮”的问题。我国语言学界“两张皮”问题实质上就是“母语与外语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问题,是外语研究与母语研究的关系问题”(杨自俭,2001:30)。杨自俭先生关于“两张皮”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存在于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在研究领域的不正常现象。在“两张皮”的状况下,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面临种种挑战,在理论研究、理论输出与接受方面,也存在多种失衡现象。杨柳教授在其《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一书中曾指出,由于发送者的前见、偏见和理论统摄地位,也由于接受者的前理解和视界不完全融合,理论的对话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国的“倾听”和“复述”较多,主动的“言说”甚少(杨柳,2009:131)。那么,面对外国理论资源的涌入,是否我们都应该一味接受?我们中国的本土学术资源该如何融入并超越国外资源?通过对近十多年来国外主要翻译理论资源在中国的影响力的考察,杨柳进而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重视本土理论资源的发掘;二是重视跨学科理论资源的发展。”<sup>[1]</sup>而第三个努力的方向,正是学术界在晚近的一些研究中所追求的方向,即,巧妙地将语内阐释和语际接受熔于一炉,突破“两张皮”的研究模式。统观《道德经》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欣喜地发现,在“两张皮”的问题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中国的治学传统历来十分重视对经典的训解与诠释,诸如孔子提倡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强调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都蕴含着经典阐释的深刻思想内涵。现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奠基人海德格尔认为,阐释学是研究“只有通过理解才存在的那种存在着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海德格尔,1999:173),也就是说,阐释是作为“实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典籍的语内阐释和接受是典籍研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对古代先哲思想产生与存在方式的一种重要的理解、阐释、接续和再生。自战国时期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以来,历代学者对《道德经》论疏笺注、阐发玄旨的事例很多,俯仰皆是。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版本变迁;(2)真伪考辨;(3)篇章结构;(4)文字训诂;(5)学术价值;(6)思想研究;(7)注译传播。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王重民的《老子考》、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熊铁基的《中国老学史》等论著,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2016)作为《道德经》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在研究范围方面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突破。从历史视角出发,按照时间的序列,从《道德经》伦理哲学思想、自然哲学思想、生活哲学思想以及神秘主义思想四个不同的研究维度,对《道德经》哲学思想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接受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介,向读者再现了一幅中西哲学思想碰撞交融的宏大图景。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作为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源泉,老子的伦理哲学思想在东西方受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该研究首先从老子的伦理思想出发展开讨论。从“道”与“德”的伦理思维、“善”与“柔”的道德情态以及“德”之“三宝”三个层面出发阐释了《道德经》原典中所包孕的伦理思想。老子的道德伦理思想以“道”与“德”为关键词,以“善”与“柔”作为道德伦理的理想情态,“德”的实现又可具化为三个精神之宝,分别为“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杨柳,2016:8)。在解读老子道德伦理思想的基础之上,从“善”的伦理演化、“仁”的伦理异变、“修身”的伦理推演、“德”与“法”的伦理关联以及老子伦理的现代思维等思想学说入手,论

[1]杨柳:《国外翻译理论资源在中国的影响力研究:1998-2011》,〔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述了老子伦理思想在中西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接受,并将老子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进行对比,以发掘其差异性与趋同性。老子的伦理形象,更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思想单一化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除了儒家文化以外,道家文化也是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源泉。这一新的研究成果也为中西伦理思维的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西伦理思想的碰撞带来了老子与西方伦理思想的全新理解,呈现出中西伦理融合的独特景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诠释的宇宙观对中西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道德经》的最新研究从宇宙起源和生成观、自然变化的辩证观以及“道法自然”的无为观三个方面对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追溯了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轨迹、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并对其在西方语境下的演变和接受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分析 and 评价。研究发现,古今中国文化对老子自然哲学思想的阐释和接受主要聚焦于以“道”为万物本源的宇宙观和以“任自然”为主要特征的无为观两个方面。在分析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在西方的接受效果时指出,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不但在西方历史上获得了认可和接受,在现当代,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出现了与西方现当代自然哲学互通的倾向(同上:42)。对老子自然哲学思想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阐释与接受的探究,为中西自然哲学的对话、交流与互通提供了新的思路。

继对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的探讨之后,该研究转向了对老子的生活哲学思想在海内外接受的考察。从生活认识论、生活实践论和生活道德论三个方面详细地解读了老子《道德经》中蕴含的生活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老子的生活哲学是建立在他对“道”的认识上,并在此基础上塑造和发展他的生活实践观。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生发之源,是万事万物运行之理,是人类认知与实践之法则。统治者要尊重“道”,顺应“道”,百姓的生活才能安宁融乐。老子生活哲学提倡“知其雄,守其雌”,启发人们选择“致虚守静”、“上善若水”的生活方式。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第五十一章),从国家治理到邻里相处乃至家庭关系,无处不体现着“德”之生活准则。在考察了《道德经》生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之后,选取了三国、唐宋、明清以及现当代四个历史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注本,对老子生活哲学思想在中国本土的阐释与接受进行进一步分析。与此同时,将老子的生活哲学与西方生活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了中西生活哲学思想融合的现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老子的《道德经》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伫立于世人前,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想和谜思。关于《道德经》的最新研究,从词源角度入手提炼出老子神秘主义哲学的四大特征,即:(1)非理性;(2)神/终极存在具有超验性;(3)神/终极存在不可知;(4)人追求与神/终极存在相结合的神秘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对《道德经》中的神秘主义思想进行细致的解读。在分析比较老子神秘主义思想在中西方的阐释与接受情况时,作者指出,在中国,老子的神秘主义多从理性和非理性角度进行解读或对其进行驳斥;在西方,老子的神秘主义则围绕着“道”是否具有超验性或者神性而展开,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神秘主义解读到“去神秘主义”解读的过程(同上:70)。

不难发现,语内阐释与语际接受研究的有效结合为读者呈现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族群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多样理解,具有独到的创新价值。《道德经》在不断的接受、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活力,产生了新的意义,成为具有恒久魅力的经典作品。

## 二、从“单一”理论视角到鲜明的“跨学科”意识

目前,国内典籍翻译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逐渐成为翻译学科的热门研究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到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中来。据笔者查询,2001年至2017年近16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有关典籍翻译的学术论文高

达1056篇。然而,发表的学术论文虽数量庞大,但理论视野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多元融合。“正如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教授罗尔·斯德克斯(Roel Sterckx)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经典的解读要多向度地进行。因此,斯德克斯教授研究中国的经史子集就不但关注这些典籍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而且对于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断裂处和多面性也特别地关注。”<sup>[1]</sup>就《道德经》的最新研究而论,研究视角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视角,转向了鲜明的跨学科研究。传统的《道德经》翻译研究视角更多地偏向基于某一理论的研究视角,如语言学理论、阐释学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改写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等等,并取得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而最新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成功地将语言学、哲学、文化学、美学、诗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融入到《道德经》接受与翻译研究当中,通过从社会历史环境、意识形态、语言形式、审美取向、诗学规范、文化差异等多维度的文本解读,对《道德经》的翻译与接受现象进行立体、全面的观照与阐释。扩大了研究的视阈,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为读者提供了研究这一道家经典的不同思维空间和多种路径。

具体而言,作者首先从文化研究领域中引入“意识形态”概念,从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和发展着手,探讨文化危机中《道德经》的翻译及其制控因素、原因和策略选择等问题。通过对理雅各、卡洛斯、韦利、林语堂、刘殿爵、柯瑞等众多译者大量翻译案例的分析,发现从翻译文本选择、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体风格的选择,再到文本的生成、出版和流通,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操纵作用。它的表现形式并非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加以强行干涉,而是以一种“温和”的面孔活跃于翻译活动当中,从而顺利地实现“他者”文化与思想在异域的传播、接受和认同(杨柳、王守仁,2013:24)。作者指出,想要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保留自己的“异质”文化身份、实现文化认同和融合,需根据当前意识形态的需求选择恰当的文本以及翻译策略,并考虑语篇全域的解决方案(杨柳,2016:108)。这一发现赋予了意识形态以新的诠释,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参考。

随后,在吸收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中“对等论”内涵的基础上,作者创造性地分析了《道德经》翻译中的“文化不等值”现象,即“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原语与译语的文化不等值而导致的文化语汇失真、文化内涵缺失、文化意象变形甚至扭曲的现象”(同上:110)。继而以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为研究个案,从中国历史文化、汉语特殊用法、道家哲学概念的翻译等三个维度分析了韦利《道德经》译本中的“文化不等值”现象。研究发现,“对等派”追求的原语与译语的翻译等值,以及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审美反应趋同的效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一种理想。因此,对翻译中“文化不等值”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实、全面地认识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厚重文本外译的现实意义。

此外,从美学理论出发,以中、西大量美学形态各异的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道德经》的翻译、审美与文本接受的问题。《道德经》因其具有极高美学价值而享誉世界,道家的母性之美、辩证之美、玄妙之美和悖谬之美构成了《道德经》独特的美学风景。那么,《道德经》原本的美学意蕴是如何被诠释与传译进入异域文化之中的呢?接受效果如何?通过研究,作者发现,《道德经》的美学价值在翻译中可能会失落,第一是由于文化间的固有差异,英语文化中无法找到与中国文化对应的美学意象;第二,每位译者的审美旨趣各有不同,影响了《道德经》美学意蕴的表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文本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果。因此,“在对《道德经》中的美的诠释与传译的过程中,主要采取本土化和陌生化两种表现方式,本土化手法从接受者的角度翻译原作,译文接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陌生化手法则更注重展现原语中的文化意蕴,译文接近原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然而,大多数的英译本都无法再

[1] 康禾:《理解中国从神农开始——英国著名汉学家罗尔·斯德克斯的中国观》,〔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现原著的形式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sup>[1]</sup>

《道德经》有“哲学诗”的称号,每一章都是一首诗,其中蕴含了极深的哲理。最新研究亦着眼于诗学的视角,从诗学所涉的字词、句法和修辞三个方面分析《道德经》原本及译本的诗学特色及译者们采用的诗学翻译策略,力图揭示诗学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道德经》诗学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给众多译者翻译和研究《道德经》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推动了《道德经》文本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发现,译者们采取的诗学策略和本人的诗学态度和所处的诗学环境密切相关(杨柳,2016:175)。

《道德经》的最新研究成果秉承了“跨学科的译学研究”这一理念,将《道德经》翻译置于全球化视野下,融合多学科研究视角对《道德经》翻译问题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探讨。其研究表明:《道德经》的异域旅行过程是中西哲学思想遭遇、碰撞与磨合的过程,期间会遭遇各种复杂的因素,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审美取向和文化差异等都会使得译作与读者、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等发生强烈碰撞。

### 三、“多向度”的方法论

所谓“方圆之理含规矩”。欲了解事物的形态,方法为关键。在关于《道德经》的研究方法上,传统的历史描述法、理论思辨和理论描述法、个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语料库等研究方法都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如王剑凡的《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借助多元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以思辨方式对传教士时期《道德经》英译经典文本和边缘文本的成因进行分析;费小平在《〈老子〉六译本选评与中国传统文化名著重译探讨》一文中,通过对胡子霖译本、辜正坤译本、冯家富(Gia-fu Feng)与简·英格丽丝(Jane English)合译本、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译本、老瓦尔特·哥恩(Walter Gorn Old)译本和何光沪等人译本的比较分析,从文化角度探讨翻译中接受者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文本塑形所产生的影响;赵颖的《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两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以吴经熊和韦利的译本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语料库的方法,从词汇、句子、语篇的叙述视角三个层面开展译者翻译风格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出发,对《道德经》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

与前期研究不同的是,《〈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采取了“多向度”的研究方法,将《道德经》的翻译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具体来说,是以接受美学的研究范式为主,综合运用历时与共时相补充、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立体、全面地呈现《道德经》在中西文化语境下接受与翻译的图景。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研究范式将研究重心由作家、作品转向了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接受,就纵向而言,每个时代的不同时期,都会有自己特有的感悟;横向而言,同一时代的同一时期,又会有不同读者群、不同接受类型的特有视角。关于《道德经》的最新研究以《道德经》绵延持续的接受史为依据,按照时代顺序,历时性地描述了《道德经》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起源、发展轨迹、接受情况及其对中西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具体到各个时期,又以共时性的眼光,比较分析不同读者、不同著述对《道德经》的研究、阐释和评价。如在论述老子的伦理思想在中国本土的阐释和接受时,分别谈到儒家、墨家、法家视野中老子的伦理思想;在探讨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在西方语境下的解读和接受时,具体论及古希腊的“哲学之父”泰勒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提出西方“逻各斯”的赫拉克利特等人的思想学说。通过比较发现,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老子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阐释或证明自身的理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与老子思想融为一体;在西方,

[1]杨柳、范娟:《〈道德经〉的美学特色与翻译》,〔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道德经》被用来证明西方思想的优越性,或者充当解决西方问题的良药和出路;在当代,《道德经》又与西方后现代的思想相遇,发生了种种对话和交流(同上:196)。

此外,在考察《道德经》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情况时,对《道德经》在德国、俄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几个主要接受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同时,在纵向比较方面,以时间为轴,历史地描述了《道德经》在几个主要接受国的翻译概括、传播路向、发展轨迹和影响效果。作者立足于史料,言必有据,对比清晰,其中又不乏个案研究中的诸多闪光点,为读者认知《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情况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和语料。

#### 四、“多重”实践价值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是必由之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最新的《道德经》研究具有多重价值,包括《道德经》的译介规律和传播策略,译者与译本研究的宝贵素材,以及《道德经》在不同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

正如上文所言,传统《道德经》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译者翻译特点的描述、分析以及译文中的哲学术语处理和风格对等的批评方面,而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高度来审视其外译和文化传播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关于《道德经》的最新研究中,作者指出,为了让译语文化中的读者更准确地了解原语文化,翻译策略上可尽量使用异化法、附文本法、夹注法、解释法或比较法,以便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语文化,同时又具有较好的可理解性与接受性。在面对原典中严谨而优美、简单而深刻的语言挑战时,译者宜采取归化翻译的策略,将意合之汉语转换为形合之英语,从而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领会《道德经》的要义,以此达到文本和文化传播的目的。最新的研究力图揭示《道德经》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译介规律和传播策略,为当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新的实践样板。

此外,以往的《道德经》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个译本研究以及两个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而最新的研究选取了湛约翰(John Chamles)、卡洛斯(Paul Carus)、翟理思(H. Giles)、欧德(Walter Gorn Old)、初大告(Chu Ta-Kao)、韩禄德、林语堂等各个时期风格迥异的中外译者的众多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为《道德经》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同时,还全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从事《道德经》相关研究的历史文献成果,堪称《道德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道德经》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道德经》久传不衰,其应用价值历久弥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从《道德经》中寻求古代东方智慧的底蕴。在哲学领域,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谢林、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接受并成功运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最著名的接受者是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述治国方略。在自然科学领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来解读《道德经》,认为道家思想表现出强烈的科学、民主特性。在文化领域,俄国文坛泰斗托尔斯泰在翻译和研究《道德经》的过程中对老子的伦理思想和生活艺术观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可以说,最新的《道德经》研究充分挖掘了其在异文化语境下不同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深具启发意义。

#### 结 语

《道德经》已经经历了约两千多年的阐释、接受史,老子的智慧却卓然独立于千古,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自然科学、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总结全文,我们就会发现,从古代传统到当下,对于《道德经》的研究已经跨越了漫长的历史长流,从研究范围、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到实践价值等方面都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是,正如萨特所言,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已知数,它是“一个媒介物”、“一个半成品”、“一个向读者的自由发出的召唤”(萨特,1991:450)。那么,毫无疑问,对于《道

德经》的翻译与研究也将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新的变化,展示出新的文化图景和意义。

###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费小平:《〈老子〉六译本选评与中国传统文化名著重译探讨》,〔贵阳〕《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4. 老子:《道德经(苏南注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 〔法〕萨特:《萨特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6.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7. 王重民:《老子考》,〔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1927年版。
8. 王剑凡:《中心与边缘——初探〈道德经〉早期英译概况》,〔台湾〕《中外文学》2001年第3期。
9. 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0. 杨自俭:《再谈“两张皮”问题》,〔大连〕《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0期。
11. 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2. 杨柳等著:《〈道德经〉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接受与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3. 杨柳、王守仁等著:《文化视域中的翻译理论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 赵颖:《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两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北京〕《中国翻译》2015年第4期。

〔责任编辑:平 啸〕

## Studies on *Tao Te Ching*: A Classical Combination from Intralingual Reception to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Yang Yan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has been taken seriously as a hot issue by the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years. *Tao Te Ching* is one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classics, and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Tao Te Ching* have already spanned thousands of years. By conduc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Rece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ao Te Ching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value of the lates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research scop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practical valu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atest research on *Tao Te Ching* makes a breakthrough both in intralingual reception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by demonstrating a new trend of innovative research scope,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multiple practical value. Therefore, the latest research is of unique academic value, considerably enlarging the spac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Keywords:** *Tao Te Ching*;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lassics;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foreign cultural context